

裴汝誠教授八秩壽慶

論文集

李偉國 顧宏義 主編

裴汝誠教授八秩壽慶

論文集

李偉國 顧宏義 主編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裴汝誠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李偉國,顧宏義編.

—北京:中華書局,2011.10

ISBN 978 - 7 - 101 - 08229 - 6

I. 裴… II. ①李… ②顧… III. 史學－中國－文集

IV. K207 - 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202562 號

書名	裴汝誠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
編者	李偉國 顧宏義
責任編輯	樊玉蘭 王芳軍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刷	北京天來印務有限公司
版次	2011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規格	開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張 38 1/2 插頁 4 字數 500 千字
國際書號	ISBN 978 - 7 - 101 - 08229 - 6
定價	88.00 元



裴汝誠先生在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第一次修纂工作會議上發言（2007年5月于北京）。



裴汝誠先生與漆俠先生合影。



裴汝誠先生與陳樂素先生、梁太濟先生合影
(1985年于暨南大學)。



裴汝誠先生與鄧廣銘先生合影（1988年10月于西安）。



裴汝誠先生與徐規先生合影（1990年于徐規先生家中）。



裴汝誠先生與張亮采先生等合影（1956年元旦于東北師大）。前排左起第二人為張亮采先生，後排正中為裴汝誠先生。



裴汝誠先生與研究生合影（1981年于上海師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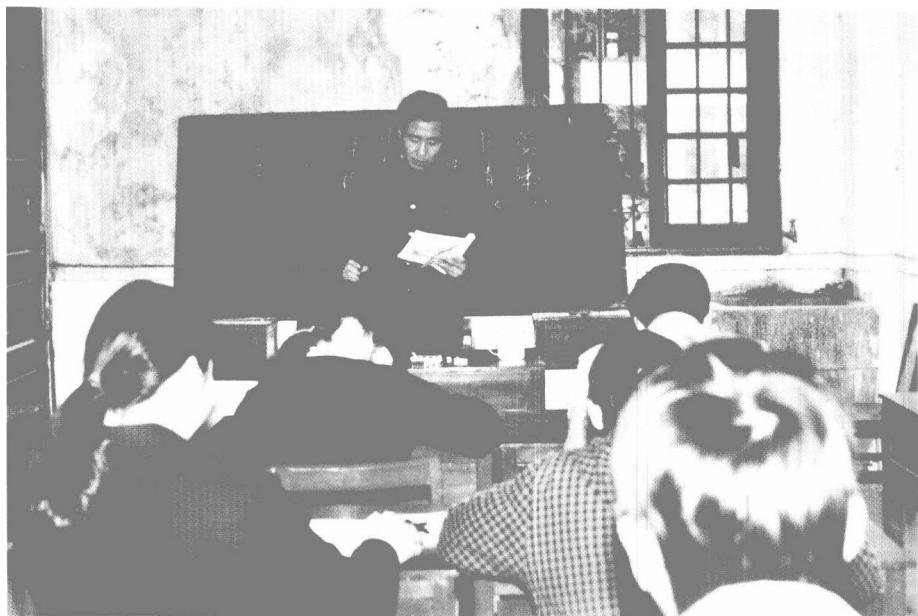
裴汝誠先生在書齋。



裴汝誠先生與王雲海先生及河南大學研究生合影（1986年于河南大學）。



裴汝誠先生與學生在一起。



裴汝誠先生在授課中（1987年于廣西師大）。

目 錄

師友教我前進	裴汝誠 (1)
必然規律與中華文明的未來趨勢	姜錫東 (27)
“人定勝天”語義演變歷史考察長編	李偉國 (47)
“刑不上大夫”舊解發覆	
——兼答司馬君實《進士策問》	呂友仁 (89)
王道思想與以人為本	張希清 (105)
宋代律學的表現特徵	郭東旭 (117)
掩映之間：宋代尚書內省管窺	鄧小南 (129)
宋代監司制度述論	金 圓 (167)
宋代籍帳制度探析	
——以戶口統計為中心	戴建國 (185)
宋代買撲坊場管理制度述論	許沛藻 (215)
兩宋時期明州地方官僚體制研究	
——以監當官為中心的考察	苗書梅 (227)
北宋初期轉運使制度的演變	戴揚本 (239)
高宗朝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初探	于士倬 (261)
宋代公使錢研究	俞宗憲 (293)

公私之間

- 司馬光嘉祐年間的理財主張辨析 任仁仁(315)
 明清京債研究 劉秋根(325)

“晉王有仁心”說辨析

- 兼及宋初“斧聲燭影”事件若干疑問之考證 顧宏義(347)
 關於宋神宗元豐用兵的幾點辨析 凌皞(381)
 懷素生年考 鄭明(389)
 《宋史·韓頴傳》書後 呂曉閔(403)

- 《新五代史》注文內容研究 張明華(415)
 論劉摯及其著作 陳曉平(427)
 論宋人長編體當代史的崛起 孫建民(459)
 宋代火災研究：讀《宋史·五行志》 顧吉辰(473)
 宋代末年史料鉤沉 孔學(487)
 《宋史·宗澤傳》取材考詳 嚴文儒(511)

《四庫全書》文淵閣本與文津閣本比較：以畢仲游《西臺集》為例

- 兼論文津閣本《四庫全書》的價值 馬玉臣(521)
 銀峰告政一千里 雁塔聯名四十年
 ——李彌遜《寶學連公挽詩》史學價值研究 蕭魯陽(563)
 《東京夢華錄全譯》引言 姜漢椿(575)
 十八卷本《續資治通鑑》考略 燕永成(587)
 《四庫提要》璧瑕微指 高紀春(597)
 後記 李偉國(609)

師友教我前進

裴汝誠

當下社會上流傳着一句順口溜，末後幾句是：九十不爲老，一百不爲稀，七十八十小弟弟。我就是這充滿幸福的社會中的一員小弟弟。

回顧讀大學至今的六十年，感悟到以下三句話：

學習時，莫過於受教遇上好老師，這是最大的幸福。我是幸運兒。

科研時，莫過於自己喜愛，這是最大的快樂。我是快樂人。

教學時，莫過於學生勝過自己，這是最大的成功。我是成功者。

頌 師

我是 1951 年入讀天津津沽大學師範學院史地系（院系調整時改爲天津師範學院，後爲河北大學歷史系至今），1955 年考入東北師範大學歷史系中國中世紀史研究班，1958 年分配到上海師範學院（今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及中世紀史教研組任教，1971 年春離系成立二十四史標點組（《宋史》點校組），1981 年調入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所任職至退休。六十年中，師恩與學海共存，教誨與成長相伴。受教之多，終生不忘。由於我喜愛宋代史，所以和宋史相關的老師接觸更爲密切些，而實際給我指導和關懷的老師遠多於下面將要述及的幾位。

漆俠先生

1954 年，我們師範生要教育實習，恰巧我和我愛人的實習指導老師，在師院是漆先生，在師院附中是漆先生的愛人萬先生，時間雖短，但接觸很多，師生間稔熟

了。從此以後，直至先生辭世，聯繫不斷，給我教導最多、時間最長的老師就是漆先生了。幾十年間，耳濡目染的是先生手不釋卷，筆耕不輟。他關心學風，強調讀原著，看原始資料，提倡多思。先生的言傳身教，使我懂得了“業精於勤”的道理。苗書梅同志對我說：“漆先生一天三班，我們學生怎敢偷懶？”劉秋根同志說：“河北大學辦公室、資料室，最後熄燈的是宋史研究所。”漆先生教出來的學生也是最“勤”的。先生用功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給研究生教授馬列著作。如果說過去對經典著作是讀得多和讀得少的區別，後來則是讀與不讀的區別了。說漆師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不為過，而且我相信，如果有人研究中國與當代史學史，必會研讀漆先生的大作，他是自覺學習和運用馬列經典研究歷史的。

如果因此說漆先生不注重史料，那是出於不瞭解。大家，史學大家，沒有看輕史書的。漆先生 50 年代發表《王安石變法》，最後的附錄部分是用《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下簡稱《長編》）校《宋史》，這正是鄧先生指導漆先生做論文時的首要工作。

我參加整理《宋史》時，1971 年去看望先生，先生一再叮囑我多向鄧先生請教。當我告訴他，已經去看望過鄧先生，鄧先生對我們工作的支持時，漆先生說：“你們做得好！找對了人。”90 年代，漆先生出國講學，事前對我說，請河北大學宋史研究所的高紀同志到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所進修，請我安排。可見，漆先生是相當注重古籍整理的。而我正是在先生的鼓勵下，堅持這項工作的。先生留給人們的治學經驗，是充分佔有史料，用馬列經典駕馭分析資料。

張亮采先生

我讀研究生時期的導師張亮采先生，長於宋遼、宋金關係研究，曾致力於宋代風俗文化研究。50 年代，先生考訂宋、遼榷場貿易的文章，我在 80 年代參加河南大學研究生畢業論文答辯時，還見到研究生引用，可見影響之深。先生注重培養學生的教學能力，為了我們走上教學崗位的需要，先生為我們蒐集了近三十個專題，每個專題都有綱目，有必讀書目、參考書目以及討論題目，頗為實用。

張家駒先生

我的導師張家駒先生，多年協助譚其驥先生整理歷史地圖，特別是楊守敬地圖。我曾擔任先生主講的歷史地理提高課的輔導工作。先生是歷史地理學專家。

他撰寫沈括傳，涉足科技史。他寫黃道婆，并指導學生實地調查研究，填補了地方史和我國手工紡織業史研究的空白。他發表《趙匡胤論》及《趙匡胤傳》，為北宋初年的政治史研究作了貢獻。他撰寫關於《辨奸論》的討論文章和山水砦起義軍的文章，對宋史研究都有一定作用。特別是他多年著墨宋代經濟中心南移的著述，有着開先河的引導作用。先生指導我們研究宋代轉運使和轉運司路，是想讓學生們在他過去《宋代路分考》的基礎上擴展一步。這又涉入宋代職官和行政地理。先生在研究宋代歷史的同時，對於《宋史》這部史籍也是用功多年，十分熟悉的，所以在考慮點校分工時，上海師院認報整理《宋史》，並得到了認可。

鄧廣銘先生

讀書時常聽老師談起鄧先生的文章和著作，讀研究生時，專題報告中經常介紹鄧先生的觀點看法，譬如唐代的均田制、宋代官制等等。後來報紙上有招收副博士生的導師名單，鄧先生名列其中，我和楊德泉同學都有意報考鄧先生的專業，因故未果。1971年我參加點校《宋史》之後，在中華書局參加會議期間，又和上海歷史研究所的王修齡先生一起拜訪鄧先生，親聆先生指導，得益甚多。先生還親手交下百衲本《宋史·食貨志》等點校的稿本。之後，我們還從中華書局趙守儼先生處得到經鄧先生同意借閱的宋人碑傳索引，使我們的點校工作大受裨益。鄧師的學術無私，感人肺腑，學識之淵博，令人欽佩之至。能到師門學習，就成了至誠的願望。而每次趁進京開會、看書的機會，每屆研究生畢業的論文題目、要點等等，我們師生都向鄧先生討教，祇要得到先生的首肯，我們就放心了。

時光荏苒，轉眼十幾年流逝。1986年，在馬力、張希清、鄧小南同志大力協助下，我成了北大的一名訪問學者，正式成為鄧師的學生。時屆五十五歲。我感謝老師，感謝各位師弟幫我實現了企盼已久的願望。記得我住進健齋的最初些天，是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我進修的內容是北宋後四朝政治史。在寫了兩篇文章之後，就因教學工作的需要召回到學校了。但我依然將自己參加的點校工作，乃至研究生畢業論文的選題和提綱，都向老師請教。老師首肯後，自己就落實了，放心了。老師辭世後，特別是1999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仰止集》之後，我經常拜讀各位師友的追憶文章，老師的音容笑貌，精闢見解，治學經驗，躍然文字間，猶如再聆師教。老師的道德風範如同淨化劑，使人可以抵制歪風邪氣，淨化靈魂。老師治學經

驗，具體到“四把鑰匙”，去偽存真，由表及裏，求真與獨斷，史料與史學等等，以此學習研究，問題就會得到較好地解決，學習中就有些進步。所以這部《仰止集》出版之後，我是受益很多的。

陳樂素先生

我讀研究生時，學年論文是關於宋、金交戰的，當時張亮采先生讓我先讀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以下簡稱《會編》)和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以下簡稱《要錄》)等。因此我就讀到了陳先生關於《會編》的大作和關於徐夢莘的文章，並為這兩篇文章所吸引。三十年後的 1985 年向先生說起此事，先生說，抗日戰爭時期，研究《會編》一類書籍的文章多是和時代、時局有關的。陳先生早年就是愛國的史學家。先生研究《宋史·藝文志》、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與我們整理宋代史籍有着密切關係。我曾請陳老到學校為我們作報告，也曾在先生書房看到手抄的多冊資料，當時我就想，陳老真是厚積薄發的學者。尤其教育人的，是先生每次來上海前，總在事前給我一函，叮囑祇住招待所，不住賓館、專家樓，旨在節約點經費，給青年教師出外參加學術活動提供經費。陳老體諒國家，關愛學子，是一位道德高尚的學者，我敬仰的老師。

徐規先生

從 1980 年以來，我和徐規先生的見面機會多了，所受教育自然就多起來了。我們整理李燾《長編》之前，我已經拜讀過徐先生的大作《李燾年表》。在啟動《長編》的點校工作後，才從趙守儼先生處得知，徐先生已先於我們準備點校此書了。這時我十分擔心，無法解決這次“撞車”問題，遂向徐先生如實說明。徐先生當即表示：你們人多，又已開始了工作，就由你們整理吧。不但絲毫沒有為難之意，還問了我們所用的底本、校本等情況。我是喜出望外，立刻向其他參與此役的先生通報了這個喜訊，大家對徐先生的風範讚嘆不已。待《長編》的前兩冊出版後，徐先生又對我指出，以後看校樣要仔細，“都虞候”的“候”都排成了“侯”字，一個也沒有校出來。我聽後面紅耳赤，却十分感激老師的指教，內心升起無限敬意。從此以後，凡是我到杭州或是先生來上海，大家總要說一聲，我總要到先生跟前問安，也總能受到教誨。當我 2007 年參加點校本《宋史》修訂工作，計劃向先生請教、彙報時，先生已因

病失語了。此前，我讀過先生的大作《宋史地理志補正》，並已逐條錄在了書上，但是也有個問題盼先生指教，即先生用他書，如宋人的總志補《宋志》，屬校史問題，不屬版刻錯誤，按體例不需補，想請先生予以指示。見到先生失語的病狀，我沒有提這個問題，失去了一次請益的機會。

謝 友

1971年春，我奉調離系成立二十四史標點組，不久，上海和北京分工，上海點校《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和《宋史》共五史。又依據各史的關係和份量，決定復旦大學承擔《舊唐書》、《舊五代史》，華東師大承擔《新唐書》、《新五代史》，《宋史》部頭大，由上海師院和上海社會科學院承擔。業務分工之後，各單位都在抽調人員組成標點組，我和社科院臧榮炳任《宋史》組組長，浦增元任副組長，張家駒、湯志鈞任通讀。上海師院陸續調入十二人，由中文、歷史各六人組成。上海社科院由歷史所、法學所、經濟所調人。人員較多，又因工作需要的原因調人調出。不久，復旦大學又為各史調配人員，《宋史》組有魏嵩山、王文楚、鄧廷爵、汪槐齡等先生。大約過了半年時光，人員組織工作告一段落。與此同時是調集圖書資料，《宋史》組前後調入資料室的書籍很多，並有從上海社會科學院圖書館借調的書籍，從中華書局調來的資料等。初始階段的工作，主要是試校點，定體例。當時的參加者都要試點，試點的內容有《太祖紀》、《宗澤傳》、《趙鼎傳》等。試點從對版本開始，標點則學習解放初期頒行的標點符號使用辦法，以及參考已經前此出版的《史記》、《漢書》體例。經過認真的討論（是逐句討論），把看法相同者定為體例，以文件的精神為指導，結合試點討論意見而成。大家認為，定體例時費些時間是值得的，因為人多手雜，沒有體例，會造成標點與校勘的不統一，譬如長句和短句，各人習慣有不同，標點就不一樣，如此等等。最後整理出一份《宋史》點校體例。在這個階段，上海人民出版社標點組的同志隨時和各史溝通，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和王修齡先生參加中華書局的二十四史學習班，會上會下向各地學者學習到許多知識技能，傳達後，也有很好的效果。特別是請到趙守儼先生到校報告、座談，給我們的工作帶來極大的幫助。點校工作是中文、歷史各一人組成兩人組，各人點校，相互交換，意見一致後交通讀，意見看法不能統一者，在每週五下午的學習交流會

上討論。這些制度對初次點校的先生們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經過長達六七年的認真工作，在上海社科院、復旦大學、上海師院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集體努力下，完成了任務，而且為以後的工作培養了人才，摸索了經驗。

在說到當年《宋史》點校工作時，還須說到 1971 年上海接手整理之前，中華書局於 1961 年請聶崇岐先生，1963 年聶先生逝世後，又請羅繼祖先生和鄧廣銘先生做過工作。1971 年重啟點校工作之際，我和王修齡先生從中華書局收到精裝四冊一部《宋史》，已經聶先生親自標點一過，但沒有校勘記。收到羅繼祖先生所寫資料卡片若干，又從鄧先生處得到標點過的百衲本《宋史》七冊。雖然沒有看到聶先生校勘《宋史》凡例七條，但其中關於校勘和考證關係的意見是聽說過的，也在中華書局舉辦的學習班上討論，會下繼續請教過。因為當時的文件明確，整理工作以版本對校為主，在點不斷、讀不通的地方，適當採用本校、他校，而使用理校更要慎重（此處憑記憶），反對繁瑣考證。但是，必要的考證和繁瑣考證的界限如何掌握？如“江寧軍”和“寧江軍”一錯一對，但和人名一樣，都不存在點不斷的問題。聶崇岐先生認為“現所根據整理的《宋史》是元至正本，也是《宋史》的祖本，除了個別缺頁的地方外，不再作版本校勘”（下略），今天見到這個意見，就想到當年見到的四冊精裝本《宋史》上主要是標點而少校勘的緣故了。我們經過實踐知道，百衲本《宋史》，既有至正本，又有成化本，與聶先生對版本的判斷出入很大，如以百衲本作底本，不作校勘不行，作校勘也不能完全解決問題。從《宋史》版本源流簡單的實際考慮，不能不多些本校和他校工作。加上當時又採用了“不主一本，擇善而從”的辦法，所以最後完稿時，《宋史》竟有了多達四千八百多條的校勘記，而所謂“擇善而從”，擇的結果，殿本、局本的“善”很少，實際上仍是以百衲本為主了，祇不過不是“祖本”，而是“主本”了。校勘的精神，還是採納了許多先生的意見，從實際出發。經許多年、許多位先生的共同努力，纔完成了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的點校本《宋史》。

《宋史》點校工作接近完成之前，各人進度不一，先完成任務的同志怎麼辦？當時五校合併，《新唐書》組在上海師大總部（今華東師範大學中山北路校區），原上海師院（今上海師大）為分部，《新唐書》組任務完成得快，人員又怎麼辦？於是從 1976 年開始，我們考慮人員出路，是留在標點組，還是重回中文系、歷史系？經多次商議，我們決定整理李燽《長編》，一是此書為宋史研究的重要典籍，可以說是研究北宋史的第一典籍。二是此書卷帙多達五百二十卷，可以由多人參加，以減少上